

文章编号:2095-0365(2015)04-0034-06

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

——兼谈杜香文等著《石家庄之根——封龙山》一书

吴秀华

(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,河北 石家庄 050024)

摘 要:封龙山文化研究是石家庄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杜香文等合著的《石家庄之根——封龙山》一书,对此有开创之功。然而该书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,反映了封龙山文化研究中,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。只有严谨的态度,科学的方法,才能产生高品位的著述,夯实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根基。

关键词:封龙山文化;态度;方法

中图分类号:G0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DOI:**10.13319/j.cnki.sjztdxbskb.2015.04.07

封龙山是距离石家庄最近的一座名山,由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故而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,成为一块研究的新热土,也成为一个旅游的热门去处。《石家庄之根——封龙山》(以下简称《石》)一书,便是此背景下产生(该书由河北科技出版社于2012年8月出版)。该书以封龙山为中心,就封龙山名称的由来,封龙山所在郡治的变迁,封龙山的书法碑刻艺术,封龙山儒、释、道文化遗存,历代名人吟咏封龙山的诗文,封龙山一带发生过的历史事件,出现过的历史人物等问题,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考论。应当说,这是石家庄地方文化研究中,一件特别值得称道的事,有开创之功。由于石家庄建城较晚,一直被人冠以“文化沙漠地带”的称呼。本书的出现,使我们深切感受到石家庄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可以预料,《石》书必将在今后石家庄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。

在充分肯定《石》书价值和重要地位的同时,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和瑕疵。笔者认为,在地方文化研究中,尤其要讲究一个“信”字。只有提供给人以信史,才能增强地方文化研

究的厚重感和说服力。否则,想当然和戏说的做法,只能使地方文化研究变得轻飘飘无足轻重。基于此,本文结合《石》书,就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,略抒己见。一来求教于《石》书的作者和方家,二来以此说明态度严谨和方法科学的重要性。

一、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

对封龙山文化进行研究,其态度必须是严谨的。封龙山海拔不高,又近在咫尺,一些人经常来到封龙山,他们登上山顶,四处眺望,可见山下方圆十几里的村庄和田野,一切尽收眼底。这种习惯性的登临,使一些人对封龙山产生了轻蔑之感,以为不过如此而已。人们对待高山,有高山仰止之感,那是因为高山之高征服了我们,我们油然而生崇敬之情。人们对待封龙山,则没有这样的感觉,就是因为封龙山矮的缘故。矮使得封龙山变得平易、亲切,但它的平易和亲切,却反而成了人们蔑视它的由头。这不能不说是封龙山的悲哀。反映到学术研究上,人们对待昆仑山的态度,与对待封龙山的态度,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心里接受等

收稿日期:2015-03-25

作者简介:吴秀华(1963—),女,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硕士生导师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文学及地方文献。

本文信息:吴秀华.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[J].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2015,9(4):34-39.

级。这种心态的产生,对我们这些虽近在咫尺,但毕竟还没有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是如此,对那些置身其中,整日与研究对象相伴的人来说,更是如此。一些人对近在眼前,或置身其中的事物,往往会以大包大揽的态度,如数家珍,娓娓道来,其实,在他们的言谈里,多存在漏洞和错误。这是因为在研究态度上,这些人不仅矮化了物理意义上的山,也矮化了学术意义上的山,以为那是他的身边之物,可以任由他来揉捏塑造。而这种由我“塑造”的心理,也不由自主地会使他“塑造”其他的人与事。对此,《石》书中的下列例子,堪作证明。

第一,《石》书第44页,有如下一段话:明代,洪武三年,其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,建文二年,朱棣与大将耿炳文北伐,在滹沱河正定一带与元朝的军队来往厮杀,然后攻打北平,这就是民间所传“燕王扫北”。

“燕王扫北”,是民间俗称,在学界和民间有两种理解。一种指燕王朱棣奉命北伐,扫除元朝残余势力。一种指燕王朱棣发动的,旨在扫除建文帝身边奸佞的所谓“靖难之役”。比如评书家单田芳所说的《燕王扫北》,即指后者。然无论是哪一种说法,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,都存在明显错误。

首先,建文年间时,朱棣和耿炳文分属于两个不同政治阵营,耿炳文是建文帝派去镇压朱棣的,他们二人不可能协同北伐,去攻打元朝军队。

其次,在滹沱河正定一带,来往厮杀的是朱棣与耿炳文之间的军队,并非朱、耿联军与元朝军队作战。查《明史》卷四《本纪第四》“恭闵帝”可知,“(建文元年)八月己酉,耿炳文兵次真定……壬戌,耿炳文及燕兵战于滹沱河北,败绩,李坚、宁忠、顾成被执,炳文退保真定。燕兵攻之不克,引去。”显然,耿、朱之间战斗激烈,耿炳文战败,退守真定城内。而朱棣在攻之不克的情况下,放弃攻城,转而到其他地方寻找战机。

复次,朱、耿之间的交战,发生在建文元年八月,而非建文二年。这些在《明史》“恭闵帝”本纪和成祖本纪里,都有明确记载。

第二,《石》书第44页,关于《金瓶梅》著作权问题。《石》书称,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“兰陵笑笑生”。众所周知,在所有《金瓶梅》版本中,其署名都是“兰陵笑笑生”,“生”非“声”。除此之外,作者对《金瓶梅》内容的介绍,其用语也很不恰当。如第45页的这段话:书中假托宋代,实际写的就是明代晚期。书中从社会上至朝廷,下至地方官吏、

城乡豪绅,以及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,都有非常鲜明的形象。(本段的标点断句,笔者略有增改。)

本段中的“人民群众”一词,是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政治含义的词汇,特指那些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群。不要说封建时代皇权政治下的百姓不能称人民群众,就是当代触犯了法律,被判刑入狱,失去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,也不能称之为人民群众。语言不仅有阶级性,更有时代性,后人研究前人著述,切忌想当然地用今天的习惯用语,套在前人身上。否则,就会显得不伦不类,时空界线不明。即使退一步讲,封建时代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民群众,但《金瓶梅》中的奴仆小厮等下层人物,一个个寡廉鲜耻,蝇营狗苟,奴性十足,有哪个堪配“人民群众”这个词汇?

第三,《石》书第46页: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领兵入关,建立清朝,皇太极死,其儿子即位,就是顺治皇帝。

众所周知,皇太极死于1643年8月,而明朝于1644年3月灭亡。清朝定鼎北京,时间在1644年5月,由多尔袞率先进入北京,至9月,顺治帝福临才由关外到达北京。可见皇太极并没有“领兵入关,建立清朝”。何况,清朝并非入关后建立,其建立,时间在1636年,皇太极在沈阳称帝,建国号大清。

第四,《石》书第46页又称:“康熙主持编写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乾隆主持编写了《四库全书》,并把《红楼梦》收入书中。”

首先,康熙并未主持编写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主持者是清代著名学者陈梦雷。该书初名《汇编》,进呈康熙帝御览,康熙赐名为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我们不能因康熙赐名,或者因他官大位高,该书成于他当政时期,就称该书由他主持编写。

其次,乾隆年间的《四库全书》,并没有收入《红楼梦》小说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“小说家类”,收入的都是杂事、异闻、琐语类著作,相当于后世所称的野史笔记类著作。不收通俗小说,与总纂官纪昀的小说观有关。纪昀崇尚真实,贬斥虚构,对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的“燕昵之词,媒狎之态”表示不解,认为蒲松龄当时并未在场,怎么知道别人的房中情事呢?崇尚真实的纪昀,怎么会将虚构的《红楼梦》小说,收入到《四库全书》中呢?所以《石》书中的说法完全莫名其妙。

第五,《石》书第142页,关于白朴的叙述:“元军攻陷开封,白朴和母亲与父亲失散,跟随元好问

逃出京城。北上过黄河乘船时,因人多拥挤,母亲落水而亡。八岁的白朴跟随元好问回到山西,一直受到元好问的培养和教育。”

首先,白朴母亲的下落和结局,现有史料并无明确记载,仅白朴好友王博文在《天籁集序》中称:“明年春,京城变,遗山随挈以北渡,……自幼经丧乱,仓皇失母,便有山川满目之叹。”后人对白朴之母下落和结局的描述,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:

(1)“在这次战乱和变动中,崔立劫掠了不少王公大臣的妻女献给蒙古军队,白朴的母亲也在其中。”——张炯、邓绍基、郎樱总主编,杨镰本卷主编《中国文学通史》第4卷 元代文学“白朴的生平和创作”。

(2)“白朴幼年遭遇金亡变故,金都城陷落,白朴母亲被蒙古军掳去。”——于非主编,王树芳、傅治同、别廷峰副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》第4版下。

(3)“白朴的母亲张氏,或被掠入军中,或死于这场浩劫之中,前者的可能性较大,但被掠致死,也合情理。”——邓绍基著《古典戏曲评论集》。

(4)“蒙古军围攻汴梁,白朴的母亲死于战乱之中。”——兰翠、杨滨著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选读》。

以上各种说法虽然都是推论,但白朴之母或被掳,或横死,或被献,都是人们依据当时情势,做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。而《石》书中称白朴之母,“北上过黄河乘船时,因人多拥挤,母亲落水而亡”,这种说法就太过具体了。除非亲眼所见,或有专门资料进行了记载,后来研究者是不能做出如此推论和描述的。如果进行了这样的描述,就必须指明此说法的出处所在。细节决定真实,如果没有交待出此说法的理由和出处,便是虚构事实,给人以不严肃的编造之感。

其次,“八岁的白朴跟随元好问回到山西”,这种说法也明显错误。据元好问《南冠录引》、《济南记行》等文章记载,金亡后,白朴跟随元好问到达了山东聊城。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,是因为此地是元朝政府羁押金朝官员的地方,可见此时元好问处于被羁管的状态。后元好问摆脱羁管,迁于山东济南、冠县等地,直至1237年,得知白华北返真定时,才将白朴姐弟送到了白华身边。期间,白朴和元好问并没有一起“回到山西”。

第六,《石》书第143页:“因为白朴此生此世大都跟随元好问生活在一起,即使得知其父在元朝大都做官,也没有跟父亲居住。”

此种说法,可谓信口开河。首先,白朴此生此世并没有“大都跟随元好问生活在一起。”他与元好问在一起的时间,主要是从1233年起,到1237年结束,流寓在山东的数年时光。其次,就是白朴在封龙书院学习期间。然这种学习,并不能称之为“生活在一起”。事实上,白华回到真定后,白朴就与其父亲生活在一起了。王博文在《天籁集序》中称,元好问每过真定,必问白朴为学次第,这显然表明二者并不生活在一起,否则也不会向人询问白朴的学业名次如何。白朴二十二岁娶妻,二十五岁开始漫游各地,曾两游大都,到过顺天保定、安徽寿春、江西九江等地,最后又长期定居于金陵。而元好问任教封龙山期间,也多次远赴外地,参与政治活动。如与张德辉远赴上都,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。应严实、严忠济父子之请,赴山东东平考核儒生等。其足迹,遍及冀、鲁、晋、豫等地。应当说,白朴与父亲再次相聚后,他与元好问之间,便走上了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。1257年,元好问逝于鹿泉寓舍,他的学生郝经,将其灵柩辗转运到了元好问家乡秀容安葬,史料中并未记载白朴参与了此事。

其次,白朴之父白华并未在元朝做官,又何来“即使得知其父在元朝大都做官,也没有跟父亲居住”这种说法呢?白华原是金朝高官,金亡时,随金哀宗出奔河南归德,后金哀宗死,白华在河南邓州降宋,被任命为均州提督。因原金朝官员范用吉杀均州长史投降蒙古,白华也随之投降了蒙古。不久,白华北返真定,依附史天泽,虽然得到了被举荐的机会,但当时有人指责他“夙儒贵显,国危不能以义自处”,更兼“从璩归宋,声名扫地”^①的舆论存在,使得白华最终未能得到出仕蒙古政权的机会。从此他卜筑溁阳,课子读书,过起了隐居生活。这些在《金史·白华传》等史料里,都有明确记载。所以,白华既没有在元朝做官,而白朴也是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。因为“父子卜筑于溁阳”^②的史料记载,证明白华北归后,与其子女生活在一起。

此外,本书还有一些人名方面的错误。如第50页,藁城人“何基沚”,本书写成了“何基峰”。第143页,《录鬼簿》的作者是钟嗣成,本书写成了“梁嗣成”。所有这些,都说明作者的著述态度,有失认真严谨。一部书存在诸多瑕疵,即使它在其他方面有真知灼见,恐怕也会令人生疑,其可信性和著述品位将大打折扣。千里之堤,毁于蚁穴,学

术上的丰碑,不仅需要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,更需要严肃认真的敬畏态度。这是需要我们铭记的。

二、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方法

研究方法是个专门的学科领域,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很多。例如秦伟、吴军著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》、仇雨临、何凡兴著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》、赵敏俐著《文学研究方法讲义》、梁启超著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等等。此类著作,既有普遍意义上的笼统归纳,也有专门领域里的细致雕镂。研究方法没有好坏高低之分,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,最恰当的方法,就是最好的方法。方法的采择和运用,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的面目如何。目前,就封龙山文化研究来说,方法的采择固然重要,然更重要的是确立研究对象,因为方法即由研究对象来决定。

就研究对象而言,“封龙山文化”是个既具体,又比较虚的概念。说它具体,是它限定在封龙山有限的区域内,看得见,摸得着;说它虚,是“文化”的含义太广,使人有摸不着头脑之感。我认为封龙山文化研究,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。

一是它的碑刻艺术。封龙山上的汉碑,着实是个值得研究的富矿。几通重要的碑刻,包括《祀三公山碑》(存石碑实物)、《三公御语山神碑》、《封龙山颂碑》(存拓片)、《三公山碑》(存拓片)、《无极山碑》、《八都神庙碑》、《白石神君碑》(存石碑实物),这之中的现存碑刻和拓片,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鉴赏。眼下许多人之所以对它只碰触而未介入,是因为这个研究对象实在博大精深,金石之学是个特别讲究功底和涵养的专门之学,以我们目前自身的知识储备而言,尚不足以与之匹敌。封龙山上的汉碑,是封龙山文化研究中的硬骨头,也是最具历史和文化厚重感的领域。几通汉碑上的每一个汉字,其一撇一捺,笔势变化和流动,反映了汉字从篆到隶的演化过程,是汉字演化的活化石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,为什么翁方纲、康有为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等人,要一睹或临摹这之中的汉碑了。另有来自天津、日本的专家学者,亲赴封龙山,揣摩考察这几通汉碑,实在是因为它们蕴含着汉字演化的诸多信息,具有巨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。上面几乎每个汉字的样态和演化,都可撰写成文,对中国书法史、汉字学将贡献巨大。尽管难啃,但封龙山文化研究,这几通汉碑是绕不过去的。否则便是凑凑合合、虚头巴脑的浮光掠影了。对汉碑的研究,杜香文先生著有《元氏封龙山汉碑

群体研究》一书,做了筚路蓝缕的开拓工作。但他的研究,仍属于外围性质的整理工作。只有从字源学角度追踪觅迹,给每个汉字以着落,方能对得起这几通汉碑。此外,古人有名垂青史的浓厚意识,将重要活动和思想刻于石碑上,既可作为思想和行为的见证,也可传之后代子孙,以便效法。《左传》曰: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”说明祭祀活动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封龙邑作为汉代石家庄地区的“首府”,祭祀活动频繁,这些碑刻,即印证了汉代封龙邑地区,人们祈雨禳灾,对龙王和山神的崇拜与敬仰。可见这些汉碑,具有文字学、历史学、艺术学的多重价值。笔者前些年在封龙山龙泉寺,发现一通元碑,碑文作者是白朴同学、元代翰林学士、鹿泉人王思廉。碑文上记载了元代大诗人元好问,在封龙书院教书期间,当地士绅张奉先、王思廉之父等人,“陪遗山先生会饮于斯”的情景。可见封龙山上的碑刻,不止汉碑重要,其他碑刻也值得收集研究。

二是封龙山上的宗教文化。封龙山是宗教名山,有四大禅林、三大石窟、两大道观。这些都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文化,需要给予充分探讨。在王思廉所撰《龙泉院营建记》一文中,有这样的记述:“金大定二年(1162),以恩例得今名,废于国初有年矣。岁庚子(1240),同知西宁州事张公,泊乡豪裴宽辈,始具疏迎至雪溪颢公为第一代。师讳文颢,何其姓,冀之武邑人,‘雪溪’其自号也。落发于崇圣,宣讲主得法于石槽升。公出世住石槽,退席居此。稍营葺之,未毕而没。法子圆慧、圆鉴成师之志,以营建为己任,勤苦无惮,化诸有缘,使知信舍。积以岁月,为殿、为堂、为门、为龙洞、为方丈、为厨房、为僧房,而寺事始备……大德四年(1300)龙集庚子秋九月壬寅朔记。”^③这段话可称是封龙山龙泉寺佛教事业兴废的小史,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类似的文献,需要我们以慧眼、以坚韧,去发现和挖掘,以期成就封龙山佛教史、道教史的课题研究。

三是与封龙山相关的名人著述的研究。如李冶的数学成就,元好问的诗歌理论,张德辉在真定一带的治绩。另有汉唐时期,对封龙山文化锻造卓有建树者,李躬、郭震、李昉、张著等人,他们中的某些人著述宏富,值得以封龙山为切入点进行研究。说到以封龙山为切入点,有人狭隘地以为,他们的著述或诗文里,必有“封龙”二字才行,这是一种固步自封的观念。所谓以封龙山为切入点,

就是以封龙山为磁石,把这些与封龙山有交集的人、事、物、情,吸纳到一个大的封龙山文化研究的范畴里。在此基础上,可出版封龙山文化研究丛书,扩大封龙山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和辐射面。

四是封龙山一带民俗和民间传说的挖掘与整理。常言道,山民好神,河民好鬼。神之凛凛,如矗立之高山;鬼之出没,如波涛之起伏。封龙山地方文化千年流传,这之中沉淀出一些规律性的文化现象,值得收集和挖掘。笔者认为,封龙山文化研究是个开放的体系,不能关起门来研究,应当充分利用当地人文资源,将这样的课题,交由元氏当地人文学者承担。既培养人才,也锻炼队伍。

针对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,就方法的选择而言,各有不同。有的需要田野调查,有的需要历览史料,文史互证、对比分析、演绎推理等等,都是文学和历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,必须依据研究对象之不同,做出恰当的选择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地方文化中,往往存在一些似有若无,似是而非的说法、传说等。对这些传说和说法,笔者在此引入胡适的研究方法。他在谈到治学方法时说,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。要大胆地提出假设,但这种假设,还得想法子证明。所以小心的求证,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,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。”^①胡适这段话,主要针对那些不能确定的观点或事实。这尤其适用于对民间传说的研究。民间传说尽管是“传说”,然这种“传说”一旦落到实处,就须有过硬的理由和依据为支撑,否则便会成为喧嚣一时的自娱自乐,得不到响应和赞同。

《石》书中有两处大胆假设:一是第44页,《金瓶梅》作者是赵南星的说法;二是第67页,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发生于封龙书院的说法。前一个说法已经有人专门谈过,最早提出者是清人宫伟谬(见《春雨草堂别集》卷七《续廷闻州世说》),后来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5年第4期,又发表了王勉《赵南星与明代俗文学——兼论〈金瓶梅〉作者问题》一文,该文提出“《金瓶梅》很可能是赵南星在他一班朋友如吴昌期、徐新周、王义华等人协助下完成”的。王氏从“欣欣子序”及书前“开场词”入手,认为它们和赵南星有密切关系,进而认为赵南星在许多方面“都是很合适的人。”对前人已有研究,后人在研究时,一不能埋没前人的贡献,二不能重复研究。尤其不能避重就轻,只下结论,没有求证。如《石》书第45页,第四条理由,称“最能代

表作者籍贯的,是本书中运用的方言土语。本书作者发现书中多处方言土语为石家庄南部一带所独有。”对此,我们要问:《金瓶梅》中哪些方言土语,是石家庄南部一带所独有?作者这种含混一带而过的做法,使其结论如空中楼阁,难以令人信服。

关于梁祝故事产生地问题,目前已有多种说法。笔者认为,一种新说法的出现,必须有切实的材料足资证明,否则这种争产地的热闹不必参与。对一般民间传说,我们可不必计较其真假程度如何,但对封龙山的梁祝传说,却须计较一二。首先,梁祝故事家喻户晓,他们是历史文化名人,故事的产生地多在南方,封龙山冒出一个产地之说,会令人生疑。这就有必要拿出过硬的证据,否则便有炒作之嫌。其次,即使不能消除众人疑虑,也要有足资成一家之说的材料,方可见严肃认真的态度。目前,梁祝的史志记述,仅见于《元氏县志》(崇祯版)“陵墓”、“吴桥古冢”中的两条简略文字记载。然志书的作者,也不能肯定是否即为梁祝之墓,其用语仅为“相传”二字。后人拿这些材料作为定论的依据,显然是不充分的。此外,曾在封龙书院学习的白朴,撰有《祝英台死嫁梁山伯》杂剧,但这并不能说明,这个故事的生地就在封龙山。当然,《元氏县志》的记载,并非毫无意义和价值。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,即使梁祝之墓真的出现在元氏县,也并不能证明梁祝故事就发生于此。就好比全国各地建有许多关帝庙,但并不说明关羽就是那里的人,他的故事发生在那里。它只证明了传播学上的一个定律,即一个箭垛式的人物或故事,容易在不同地区落地生根,受到朝拜或纪念。这也可解释各地为何出现这么多梁祝遗迹的问题。在这些遗迹里,必有真有假,这时,傍证资料的过硬性,便显得尤为重要。前人在论证一个事实时,讲究地上资料与地下文物相呼应,主体资料与傍证资料相关联,实物年代与相传年代脉络清晰等要素,我们也应遵从这样的科学论证观念。《元氏县志》中的梁祝文字记载,还暗含着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:一个可能发生在南方某地的爱情悲剧故事,为何竟流播于相对闭塞的山邑元氏,是什么样的机缘,达成了这样的事实?这是需要后人考论的。

国内对历史名人产地多有争抢现象,现象背后大多另有名堂。反映出名人究竟在哪并不特别重要,以此为由头的旅游经济才更为要紧。这种

争抢现象,往往使一些人的学术研究,溢出了单纯真相的追求,变成了迎合地方人物需求和喜好的工具。这是拜金主义对地方文化研究的侵蚀,我们应引以为戒。

总之,封龙山文化研究,应秉持严谨科学的态度,扎实有效的方法,将其研究推向深入。只有这样,才能使地方文化研究产生高质量、高品位成果,为子孙后代留下经得起考验的信史。

注 释:

①见《金史》卷114《白华传》,第2513-2514页。

②王博文《天籁集序》,载王文才《白朴戏曲集校注》之《天籁集编年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,第237页。

③王思廉《龙泉院营建记》碑文,见于吴秀华发表于《文

献》杂志2000年第4期《元好问在真定路行迹一则》一文,第91-92页。

④胡适《胡适读书与做人》,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2013年,第112页。

The Attitude and Approches of Fenglongshan Mountain Cultural Studies: Discussing Simultaneously on *The Root of Shijiazhuang*—— *Fenglongshan Mountain*

WU Xiu-hua

(School of Literature, Hebei Normal University, Shijiazhuang 050024, China)

Abstract: The researches on the culture of Fenglongshan Mountai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cal cultural studies of Shijiazhuang. *The Root of Shijiazhuang——Fenglongshan Mountain*, authored by Du Xiangwen et al. is a pioneering work concerning the topic. However, there are many common-sense errors in the book,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appropriate attitud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conduction of research. Only with a prudent academic attitude and scientific method, can we produce the writing of high quality, and reinfor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Fenglongshan Mountain cultural studies.

Key words: fenglongshan mountain culture; attitude; approaches